



中国古代文论读本

培文书系·大学创新课程教材

主编 夏静
副主编 贾奋然 王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培文书系·大学创新课程教材

中国古代文论读本

主编 夏静 副主编 贾奋然 王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论读本 / 夏静主编.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2

(培文书系·大学创新课程教材)

ISBN 978-7-301-21970-6

I. ①中… II. ①夏…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理论—中国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1699号

书 名: 中国古代文论读本

著作责任者: 夏静 主编 贾奋然 王南 副主编

责任编辑: 于海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970-6/I·258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毫米×1168毫米 16开本 19.5印张 180千字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导 论

自我国的现代大学教育体制建立以来，在高校中文系的课程系统设置中，中国古代文论课程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因而在高校中文系学生的文学理论批评、中国文学史专业知识和人文素质养成方面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学界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统一的称谓，大体上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古代文论、古代文论等七八种名称，各人根据自己的习惯和表述时的具体语境而定。在本导论中，上面所列的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各种称谓，在行文的过程中均有出现，而不作统一。但是，虽然所使用的称谓不一，所指的对象却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

中国古代文论是一个内容丰富、形态复杂、话语形式多样的非常庞杂的思想和知识系统，其作为一门学科或者说作为一门课程的形成，情况同样复杂。因此，简要地了解一下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学科与课程形成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观念和方法层面的现象，对于学习这门课程是不无益处的。

一

按照时下学界较为一致的意见，中国古代文论学科从创建到现在，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二十世纪初学科草创至四十

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为第三阶段。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既显示出不同的发展特点，又体现出历史的承传性，而总的发展趋势则是由浅到深，由疏到密，愈来愈成熟。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古代文论学科似乎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但是它却始终对现代中国文论的发展演变起着不可低估的制衡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还将继续发挥下去。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学科之诞生，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文化、文学、学术新变之产物，无论是这一学科创建本身还是它的学科结构模式、方法系统之形成，均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密切相关。从传统的诗文评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其中存在着必不可免的历史因缘，这就是人们对文学之义界的重新认同，新的认识工具和研究方法之掌握，以及在新观念支配下，利用新工具、新方法重新发现、认识、评价、阐述和建构传统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体系之意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学科之诞生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朱自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这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就有些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1]中国文学理论批

[1]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4页。

评在传统文化的怀抱中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反而在“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的批判甚至否定之后在现代学术中取得了独立的学科位置。事情就是这样复杂，而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便不可避免地受影响于学科创建之时之文化学术思想、思潮，同时又因研究者之文化认同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研究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新旧文化、文学激烈冲突、对抗的情况下，必欲取代传统的新文化、新文学迫切需要西方理论的支持与滋养，所以文学界出现了一种极其重视文艺理论的氛围，译介、引进域外文艺理论在学界成为一种风气，以致一时出现了“文艺理论热”。在当时，有影响、有建树的文学家几乎都在文艺理论方面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别的不说，仅举后来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泰斗的郭绍虞而言，就可看出当时之情形。从1920年开始，郭氏在《晨报》副刊《艺术谈》栏目中总共发表了98篇计十余万言介绍西方文艺理论的文章，内容广泛，涉及到了西方艺术和美学思潮中的主要流派、人物及其观点。他同时还在《小说月报》上介绍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夫以及皮萨列夫等俄国文艺批评家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观点。其后，郭绍虞便进入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这一领域，他继陈钟凡之后成为这一学科的主要开拓者、推动者之一，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之话语体系建构、理论意识之进一步自觉与阐释空间之拓展、范畴和概念系统之梳理和确认、方法论之建立等等，应该说，均与他当时所掌握的西方文艺理论观念和方法系统密不可分。

在时代风气影响下，人们自觉或非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学观念，来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学观，它者不说，单就对文学的定义这一点而言，便产生了极大的变革，与传统之文学观比较出现了大的位移，

其特点是杂糅古今，中西参半。比如陈钟凡，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中，采取“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的方法，先是引证德国批评家维尼、英国批评家安诺德、美国批评家亨德等人的文学定义，并且比较了中西文学理论之异同，指出各自的特点为：“知彼所言感情、想象、思想、兴趣者，注重内涵。此之所谓采藻、声律者，注重法式。实则文贵情深而采丽，故感情、采藻二者，两方皆所并重。特中国鲜纯粹记事之诗歌，故不言及想象；远西非单节语，不能准声遣字，使其修短适宜，故声律非所专尚。此东西文学义界之所以殊科也。”然后，他便顺理成章地给文学下了这样一个中西汇通的定义：“今以文学之内涵，莫要于想象、情感、思想，而其法式则必借辞藻、声律以组纂之也，故妄定文学之义界曰：‘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1]同样，刘永济在他的《文学论》中对文学下的定义也是：“概而言之，则文学者，乃作者具先觉之才，慨然于人类幸福有所贡献，而以精妙之法表现之，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之事也。”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这正反映了当时学人们的一种眼光，一种糅合中西的理论视野。刘永济在“自序”中所说的一段话正可代表之：“其有参稽外籍，比附旧说者，以见翰藻之事，时地虽囿，心理玄同，未可是彼非此也。”^[2]

翻译、介绍西方文艺理论之热潮一过，一些学人的兴趣又立即转向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前者体现了当时文艺学者欲通过对西方文艺思想之汲纳，掌握新的认识工具和理论武器；后者则体现

[1]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9页。

[2] 刘永济：《文学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页。

了在新的认识条件下重新发现、评价传统文学理论遗产，建立中国自己的诗学系统，形成新传统。而这一译介、引进西方文论热潮过后又转向中国传统文论研究的选择，则导致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学科之出现。所以，朱自清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时还说道：“现在学术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1]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产生于新旧文化、学术交替、更新的背景之下。它的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突破了传统诗文评的疆域，使传统学术中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见解得以汇聚在“文学批评”这一题目之下，进入了研究者的视域。而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在检讨传统文学批评观之基础上，重新确立关于“文学批评”的观念，同时将合乎这一观念的有关中国文学批评的史料重新加以裁定。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史，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改变，同时还意味着传统的诗文评的现代转换。传统的诗文评最早是附骥于集部之尾的。《隋书·经籍志》将《文章流别志论》、《翰林论》、《文心雕龙》、《诗品》诸书附列总集之后，《旧唐书》因之。《新唐书·艺文志》始立文史类，附于总集之后，凡诗文评方面的专书，皆归文史类，《宋书》、《明史》等又因之。因此，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中曾说：“老名字（指诗文评）诗文评在目录里只是集部的尾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做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2]《四库

[1] 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第541页。

[2]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第543页。

全书》始别有诗文评类，与别集、总集、词曲类并列，又阐说之所以别立此类，是因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1]而已。这也可以说是对诗文评之功能的一种认识。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四库全书总纂的纪晓岚在嘉庆丙辰、壬戌两科会试中，以文学批评史策士，在当时确属创格。关于纪晓岚与传统诗文评，朱东润曾经指出：“晓岚论析诗水源流正伪，语极精，今见于《四库全书提要》，自古论者对于批评用力之勤，盖无过于纪氏者。”及“晓岚对于文学批评之贡献，最大者在其对于此科，独具史的概念，故上下千古，磊磊如贯珠，其语见于嘉庆丙辰、壬戌两科会试策问，……以文学批评策士，在当时自属创格。”^[2]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就此而建立起来了。事实上，纪晓岚关于“文学批评”的观念还非常狭窄，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所收诗文评论著之提要大都鉴裁分明，批评也较为合度，但对一些有独特创见、理论思辨较强的论著却往往贬多于褒，如对于叶燮的《原诗》，仅列为存目，并且评曰：“虽极纵横博辩之致，是作论之体，非评诗之体也，亦多英雄欺人之语。”^[3]说明其观念中之“文学批评”还仅是诗文评，尚容不下过多的文学理论。

二

文学史观的变革和对文论专著的研究，使对中国文学批评史

[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集部四十八诗文评类一，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版，第1779页。

[2]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302页。

[3]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七、集部五十诗文评类存目，第1808页。

的综合研究成为可能。陈钟凡自1923年起在《文哲学报》上发表《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并于1927年出版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体勾勒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周秦到晚清的演进线索，并且初步触及传统文学批评史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如“文学”、“文”、“笔”、“文气”、“神”、“味”，等等。陈的草创之功不可抹杀，尤其是直接启发了郭绍虞，后者毕生致力于批评史研究，将中国文学批评史推进到现代学科的成熟水平。尽管郭绍虞的专著出版于三四十年代，但他在二十年代末便已经具有了比较自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意识，而且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方向。1926年，郭绍虞在《文艺杂志》上发表“中国文学演化概述”一文，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一文，尝试对我国文学的源头“风谣”的三个要素“语言（辞）、音乐（调）、动作（容）”进行综合性理论剖析，并以此为线索，分析两者在两千年来的变迁，从而得出结论：“无论何种文体，实在都有三个共同的倾向，即（1）自由化，（2）散文化，（3）语体化。中国文学演进的趋势无论如何曲折迂回，都总是向着这三个目标以进行。”^[1]这些结论也许会随着研究的深化逐渐受到讨论或置疑，但他开创的以理论辨析去整理和研究古代文论遗产的新方法，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石。

我们认为，现代中国学者研究古代文论的始点，应该从王国维算起。王氏之《人间词话》发表于1908年12月《国粹学报》4卷12期，该著实际上是运用西方美学观念和现代学术眼光来阐释传统诗文评，正处于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分水岭上。另外，据佛维

[1] 《小说月报》，1926年第11卷。

考证，发表于《教育世界》1904年第1期未署名之《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实为王氏所作^[1]，其所体现的学术眼光和知识工具，更属于现代的了。此外，如发表于1910年4月《南风》1卷2期陈受颐的《文学批评发端》，1913年2月《中国学报》4期廖平的《论诗序》，1916年1月《中国学报》1期刘师培的《文笔辞笔诗笔考》，等等，均可作如是观。

在前辈学者们的努力下，传统文论遗产才逐渐呈现出其固有的然而却又是被重新发现的理论价值以及思维方面的奇异色彩，而早期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之实绩正由此而获致。二十世纪早期的一些古代文论研究者们大都有着欧美文论这样一个参照系统，所以，在他们的研究之中，诸如中西比较、以西观中、以西解中、援西入中这些方法之运用，便比较普遍。按照陈寅恪的说法，王国维即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2]而刘永济之《文学论》，其特点也是“以中国传统的文艺观为主干，时时参照着域外的文艺观念。作者的哲学意识颇强，重视把中国的文艺思想放在一个总体的文化背景中来考察的”。^[3]杨鸿烈在《中国诗学大纲·自序》中，则称自己“最崇拜摩尔顿在《文学的近代研究》所说的：普通的研究——不分国界、种族，归纳的研究，进化的研究”，并且说：“我这本书是把中国各时代所有论诗的文章，用严密的科学方法归纳排比起来，并援引欧美诗学家研究所得的一般诗学原理解决中国诗里的许多困难问题，如诗的起源的时代，分

[1] 佛维：《介绍王国维的美学佚文——〈孔子之美育主义〉》，《江海学刊》，1987年第4期。

[2]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3] 陆海明：《古代文论的现代思考》，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类，和功用等项。”杨氏甚至还在书中这样讲道：“所以我们现时绝对的要吧欧美诗学书里所有的一般‘诗学原理’拿来作说明或整理我们中国所有丰富的论诗的材料根据。”^[1]方孝岳亦十分推崇“中西思想之互照”的“比较文艺批评学”，他这样讲道：“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的问題，而且来自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作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方孝岳在谈到他所提出的“比较文学批评学”概念时，还说道：“‘五四’运动（民国八年）里的文学革命运动，当然也是起于思想上的借照。譬如因西人的文言一致，而提倡国语文学，因西人的阶级思想，而提倡平民社会文学，这种错综至颐的眼光，已经不是循着一个国家的思想线索所能讨论。‘比较文学批评学’，正是我们此后工作上应该转身的方向。”^[2]钱锺书则主张在研究中要探讨古今中外共同的“文心”，这是因为他认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所以在《谈艺录》中，他“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3]，正因为如此，《谈艺录》在沟通中西文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光潜、梁宗岱、宗白华等在这方面同样作出了卓越贡献。朱光潜说自己的《诗论》是运用文艺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来讨论诗的问题，“对于中国

[1] 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31页。

[2]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27页。

[3] 钱锺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诗作一种学理的研究”。^[1]在他看来，“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无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2]

关于古代文论研究之目的，民国时期的学者们也有清楚的阐述。杨鸿烈在其《中国诗学大纲·自序》中说自己研究中国诗学之目的，是为了解决诗的起源的时代、分类和功用等问题。郭绍虞则表示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之目的是“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因为这——文学批评，是与文学之演变有最密切的关系的”^[3]。罗根泽在讲到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之目的时说：“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批评而言，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就文学而言，固在借批评者的批评，以透视过去的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所以我们不能只着眼于狭义的文学批评的文学裁判，而必需着眼于广义的文学批评的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与文学原理。”同时他也认为研究文学批评史于文学史关系密切：“欲彻底的了解文学创作，必借助于文学批评，欲彻底的了解文学史，必借助于文学批评史。”^[4]

当我们回首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时，不会

[1]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作者自白》，《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2] 朱光潜：《诗论·序》，《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137页。

[3]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页。

[4]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11页。

忘记王国维、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自清、钱锺书、朱光潜等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学者。在民族文化危难之时，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民族文化信念开辟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新境界。他们将西方的思想和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之中，并且在研究中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阐释和建构，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之意义得到了延伸，为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找到了新的立足点、生长点，尽管其立足和生长的空间还是非常狭窄的。他们对传统文论所作的现代阐释，对于传统文论作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话语转化，发现、赋予了传统文论新的生命力，当然也发现了其所具有的诸多不称意之处。梳理和反思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史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问题。

三

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1949年之前的成果，除了前面已经谈到的如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等所撰写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批评史著作，以及许多学者所撰写的专题性研究著作和论文而外，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古代文论的材料收集、整理、考订、选编、释译等方面，亦有所开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1934年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李华卿的《中国历代文学理论》，1936年正中书局出版了王焕镛的《中国文学批评文集》，1937年正中书局出版了许文雨的《文论讲疏》，等等，它们都是较早出现的古代文论资料选本。其中李氏选

本，据作者自称是一部“加以相当精密的选择的中国历代的许多人们对于文学之见解与理论的辑集”^[1]，然而就书中的实际情况而言，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然并没有达到选编者所要达到的标准，然而从选编者的这一言说中，我们可以看出至少选编者在主观上是相当注重历代文论中关于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的资料收集的，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正代表了当时研究者在理论方面的自觉追求。许氏选本有一《例略》，其中说道：“本编收载中国历代各体文论，颇以自然英旨之作为主，借觐纯粹文学之真谛。其他基于社会观点立论者，少录；基于伦理观点立论者，不录。又但凭意兴，片语自赏；或出以吟咏，徒矜词致；并乖论体，概不录载。”^[2]应该说，许氏的这一选编意向所体现出来的旨趣，无不与当时的学术思潮、文学观念、美学趣味息息相通，说明选编者已经秉持西方近现代文学观念为选录标准了，而传统文学价值观中的那些以“社会观点立论”、“伦理观点立论”的主流话语，对于选编者而言，已经不再具有理论意义了。此外，选编者格外重视在传统诗文评中并不占正宗地位的“论体”，也体现出一种重视文学理论的研究目光和选编原则，而这一点与“五四”以来受西学影响而推崇理论、体系的学风是相互一致的。许文雨的《文论讲疏》同时亦是对所选编的历代文论篇章之译注本，其中多采近人、今人的文学观念来阐释古人之见，或者援引西方文学观点与古人之说相互印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学者们在新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对传统文论原典所做的译释，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论做话语方式转换的工作。这一时期，对

[1] 李华卿：《中国历代文学理论·序》，神州国光1934年版，第1页。

[2] 许文雨：《文论讲疏·例略》，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页。

于传统文学批评史料的考订、辑佚工作亦有所开展,其中又以诗话、词话的考订、辑佚成就最为突出。在古代文论研究中,文献资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研究者对资料的掌握充分与否,以及整理和训诂水准的高低,势必影响到他理论分析的深度;如果文献学功夫不到位,便往往导致研究中的理论阐释或结论性判断出现偏误。所以,这一时期的郭绍虞等的几种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以及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等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与他们在文献收集、甄别方面的国学功底密不可分。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时期的古代文论研究也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如对于传统小说、戏曲批评便关注的严重不足,则说明其时对于文学批评史范围的认识还更多地局限在诗文批评方面,反映出在文学观念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偏颇,等等,不一而足。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和教学出现了全面展开和推进的局面。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的批评史著作得到重印或修订再版,七十年代末以来,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分四卷本和一卷本两种不同版本先后出版,既满足了学生精读和教师参考的不同需要,也为深入研究古代文论的具体问题提供了初步的资料和线索。从1964年到1985年,复旦大学中文系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陆续出版。从此,复旦大学中文系便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重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王运熙、顾易生等学者又编写出了资料更加翔实、线索更加清晰、内容更加丰富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系列丛书,从而使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与此同时,其他许多学者也为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81年

敏泽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两册)出版,到了九十年代,作者又对该著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和内容扩充、订正,克服了原来书中存在的由于受写作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限制而产生的一些认识和评价方面的局限,于1993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后,又有蔡钟翔等人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以及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出版,如果再加上1990年代以来许多高校自编的古代文论教材,以及种类繁多的电大、自考教材,可以说蔚为大观,满足了古代文论教学不同层次的需求,同时也反映出新时期以来我国高校古代文论教学和研究之兴盛局面。

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在学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曾经出现过持续时间相当不短的“古代文论热”。1979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成立,1983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所创办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心雕龙学刊》两种会刊,一直坚持出版至今,对于古代文论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新时期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可以从“文心雕龙”的研究情况得到生动的展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中最富有体系性的著作《文心雕龙》,在新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自1979年王元化出版《文心雕龙创作论》始,“《文心雕龙》热”持续升温,詹瑛《刘勰与〈文心雕龙〉》、周振甫《文心雕龙注译》、陆侃如和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王利器《文心雕龙校注》、郭晋稀《文心雕龙注释》、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相继出版。此外,还有如詹瑛《文心雕龙的风格学》、牟世金《雕龙集》、张文勋《文心雕龙简论》、马宏山《文心雕龙散论》等众多的《文心雕龙》研究著作亦相继出版,体现出新时期以来《文心雕龙》研究的兴盛局面。